圖之內外—清代臺灣輿圖的多重意涵

In and Out of the Maps: The Multiple Meanings of the Cartography of Taiwan during the Ch'ing Dynasty

賴明珠／臺灣藝術史研究學會理事

Lai Ming-Chu／Association trustee, Taiwan Art History Association

國立臺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摘　要

康熙、雍正、乾隆三朝（1662-1795）是大清帝國向外大肆擴張，國勢最為強盛的黃金年代。隨著開疆闢土戰役的展開，以及統治政權的向外擴張，繪製地圖既能釐清疆域，又能具體標示出皇清管轄權的範圍，建構結合政治與文化的「視覺性」體制。17世紀晚期臺灣被納入大清帝國版圖，之後地方統治官員及中央統治中樞，相繼運用傳統木刻墨印輿圖、彩繪卷軸輿圖，以及現代經緯地圖，將東南海隅被「馴化」的荒陬邊區顯影。在清廷採用各種形式製圖學所形塑的知識／權力結構中，被視為蠻荒邊域的臺灣，乃成為帝國主體「凝視」下的客體「他者」。效忠於帝國的製圖者，透過諮詢、想像或親身履勘，製造出各式的臺灣輿圖，賦予海疆臺灣多重的象徵意涵。滿清皇朝即是以支配者之姿，操控「視覺性」建制的輿圖，將被「客體化」、「差異化」的臺灣予以收編、定義和再現。

關鍵字：臺灣輿圖、視覺性、凝視、他者、再現

Abstract

The Ch'ing Empire extended its territory during the periods of K'ang-hsi, Yung-cheng, and Ch'ien-lung Emperors (1662-1795), also known as the golden age of the Empire. After several victories of battles for pioneering and expanding the ruling regime, making maps was a task for the Empire to clarify the domain, mark the imperial scope of jurisdiction concretely, and construct a political and cultural system of visuality. In the late 17th century, Taiwan was annexed into the territory of the Ch'ing Empire. Afterwards, the local officials and the ruling center adopted traditional wood cut ink printing maps, color painting scroll maps, and modern longitude and latitude maps one after another to visualize the acclimated and desolate border in the southeast coast. The Ch'ing Empire applied various cartographies to create a knowledge and power structure, in which the newly attached borderland was regarded a wild frontier and became the objective other under the gaze of the subjective empire. The cartographers loyal to the Empire created various maps of Taiwan to endow symbolic significances to the offshore frontier by means of consultation, imagination, or personal inspection. The Ch'ing Empire, as a dominator, manipulated maps of visuality to incorporate, define, and represent an objectified and differentiated Taiwan.

Keywords: chorographic map of Taiwan, visuality, gaze, other, representation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壹、前言

17世紀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VOC）佔領臺灣，為了航運、貿易的暢通與安全，乃運用現代精密儀器與技術，測繪臺灣海岸圖、港灣圖及大小比例地圖，臺灣因而在世界地圖中得以顯影（visualizing）。西方人測量臺灣的經緯地圖，既劃定了管轄疆域又「再現」（represent）霸權國家開拓貿易、統治殖民地的演變歷程。美國視覺文化學者瑪莉塔・史特肯（Marita Sturken）及莎莉・卡萊特（Lisa Cartwright）闡述「再現」理論為：運用「語言或影像」工具，替「周遭世界製造意義」。[1]而17世紀晚期統治臺灣的滿清帝國，亦透過書寫文字和視覺影像等再現系統，建構並定義特殊歷史、社會脈絡下的臺灣，並依循建制化「運作組織的規則和慣例」，操控著「再現系統」。[2]夏黎明說：「地圖是對周遭環境的一種圖式呈現」，故「地圖繪製是指透過一套簡化過程和符號系統，將地表或空間資訊載入儲存媒體，以便將真實世界轉譯成圖像給讀圖者的一種工具和過程」。[3]清朝時期，官方製圖者運用圖像符號及文字，標示自然環境與人文景觀的分布情形，並針對實際轄區地表現象進行統治現況的描述。對統治者而言，地圖即是「一種政策的陳述」，並具有一定的「政治意涵」。[4]而轄區外的生番之域，於統治初、中期，刻意避諱不述、不入圖，也呈顯出統治者消極的政治態度。

傳統中國繪製地圖大抵分為，「計里畫方」與「山水畫法」兩種。[5]「計里畫方」採定量製圖，繪圖者先在圖上按照一定比例畫成方格狀座標網，藉此控制地圖上各要素的方位和距離。例如明朝羅洪先《廣輿圖》及陳祖綬《皇明職方地圖》即為代表。「山水畫法」則是以山水畫筆法繪圖，傳統地方志書通常採用此形式製圖。[6]而兩種中國傳統輿圖畫法，無論是強調線條的「計里畫方」，或是洋溢藝術趣味的「山水畫法」，都和講究精確性的西方地圖在工具、技法及目的上不同。

運用經緯度與三角測量法的西洋製圖於明末傳入中國，並於康、雍、乾年間為皇室所借用，多次派遣傳教士及測量團隊展開全國性大地及地理測繪工作。其中，康熙53年（1714）澎湖群島與臺灣的實地測繪，在日後臺灣方志中即多次被提及。

本文嘗試藉由18、19世紀清廷運用傳統輿圖及現代地圖，形塑、繪製臺灣的過程，探索帝國如何將外海蠻荒邊域，轉化為具有「想像空間」及「權力視野」[7]

1. 瑪莉塔・史特肯、莎莉・卡萊特著，陳品秀譯，《觀看的實踐——給所有影像世代的視覺文化導論》，臺北市，臉譜，2009年，頁32。
2. 同上註。
3. 夏黎明，〈國家統治與知識生產：清代台灣地圖的繪製與區域發展〉，《海峽兩岸臺灣史學術研討會論文》，廈門，廈門大學，2004年，頁118。
4. 艾瑞克・霍布斯邦（Eric John Ernest Hobsbawm）著，黃煜文譯，《論歷史》，臺北市，麥田，2002年，頁224。
5. 翁佳音、石文誠、陳佳慧，《康熙臺灣輿圖歷史調查研究報告》，臺北市，國立臺灣博物館，2007年，頁47。
6. 王庸，《中國地圖史綱》，北京市，商務印書館，1959年，頁31-32。
7. 林天人，〈地圖——權力的視野、想像的空間〉，《故宮文物月刊》第304期，2008年7月，臺北市，頁10。

國立臺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的視覺載體，以及其中所蘊含的象徵意涵。

貳、臺灣方志輿圖與彩繪輿圖

北宋年間（1098-1110）中國出現第一部歷史地圖集《歷代地理指掌圖》，總計44幅。其中，第1圖《流求》與第27圖《流求國》，都不是畫臺灣。[8]明萬曆36年（1608）《三才圖會》，「海南」北方畫了「琉球」；而萬曆38年（1610）《方輿勝略》，也畫了「大琉球」與「小琉球」。這些17世紀初期中國輿圖上出現的島嶼，依其地理位置也都難以斷定為臺灣。崇禎9年（1636）《皇明職方地圖》的《皇明大一統總圖》中，臺灣則被畫成北為「雞籠澹水」，中為「北港」，下連「澎湖」的三島相連形式。[9]可見從11世紀至17世紀前葉，歷代中國統治者對尚未劃入統治版圖的臺灣，不但缺乏地理空間認知，也沒有任何測繪紀錄。直到康熙23年（1684）臺灣納入版圖後，官方才開始將臺灣的地表及空間，以木刻方志輿圖及彩繪輿圖的形式，建構為「視覺性」（visuality）知識。[10]

一、臺灣方志輿圖

傳統方志在體例安排上，通常將輿圖放在書首，方便覽閱者一目了然，洞悉方志所載行政區域的範圍，以達到圖文互參的效果。王必昌（1704-1788）於乾隆14年（1749）編纂《重修臺灣縣志》說：「首繪圖，便覽也。圖先書後，自昔然也」。[11]可見方志於書首配置地圖乃是舊有慣例，目的就是便於統治者總覽轄區領域的地誌概況。

清朝時期官修臺灣方志，幾乎都會在書前插畫域內自然、人文地理圖。鳳山縣學廩生盧德嘉於光緒20年（1894）完稿的《鳳山縣采訪冊》中，評論清領以來臺灣方志輿圖繪製的要領與弊端，他說：

> 《漢書》〈地理志〉云：推表山川，是地理以山川為綱領，而城郭、村墟、津梁、塘汛、隘口附麗於其間者，……萬萬不能倒置。……凡繪圖，無論山名、水名、地名、村名，必須於四至交接之處，兩圖並書，庶使此圖可與彼圖逗合；此為最要。舊志於山則繪樹木，於水則繪波瀾，於美景則繪漁艇、浮屠，於營汛則繪煙墩、旗幟；此最可厭，今宜一切刪除。[12]

8. 吳密察、賴進貴、莊永明等著，〈地圖與臺灣——四百餘年來的臺灣地圖史〉，收入國立臺灣博物館主編，《地圖臺灣——四百年來相關臺灣地圖》，臺北市，南天，2007年，頁6。
9. 同上註，頁7。
10. 吉莉恩・蘿絲（Gillian Rose）著，王國強譯，《視覺研究導論——影像的思考》（*Visual Methodologie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Interpretation of Visual Materials*），臺北市，群學，2006年，頁7。
11. 王必昌等編，〈凡例〉，《重修臺灣縣志》，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113種，臺北市，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年，頁17。
12. 盧德嘉，〈采訪案由〉，「附修志事宜十四條」，《鳳山縣采訪冊》（一），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73種，臺北市，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年，頁12。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圖1　佚名畫家　《臺灣府總圖》（鳳山縣段）　1694　（圖片來源：高拱乾，《臺灣府志》，收入《臺灣歷史文獻叢刊》，南投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年，頁2-3。）

盧德嘉先歸納方志輿圖都以山川為主軸，並運用「山水畫法」勾繪行政區域內自然地形、地貌及人文地物。他批評舊志輿圖，喜愛在山水、營汛等「節點」（nodes），[13]添加樹木、波瀾、漁艇、浮屠、煙墩、旗幟等與地圖無關的景物，並提出應該刪除這類「可厭」裝飾性圖案的建議。盧氏之論反證了，雖然在18世紀初西方現代經緯測量法已傳入中國；但截至19世紀末方志輿圖繪製者仍偏愛使用傳統山水畫法製圖。

據統計，清代官修方志共有18部，[14]除了蔣毓英所撰第1部《臺灣府志》沒有輿圖之外，其餘17部於卷首都附有地圖。刊印於康熙35年（1696）高拱乾《臺灣府志》，卷首附有輿圖5幅：《臺灣府總圖》（圖1）、《臺灣縣圖》、《鳳山縣圖》、《諸羅縣圖》（圖2）及《澎湖圖》。[15]5張輿圖均採用山水畫法，技法雖然簡略又不精確，但卻是臺灣方志中最早附錄地圖者。之後，4部府志、9部縣志及2部廳志，也都以山水畫法搭配符號、文字，繪製行政區域圖或城池圖。（圖3）只有同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13.「節點」（nodes）一詞乃借用美國學者喬治．柯利茲（Reginald George Golledge, 1937-2009）對空間環境中「初始地點」（initial position）的詮釋。（賴進貴、黃清琦、葉高華，〈古地圖的空間認知探索——以1878年《全臺前後山輿圖》為例〉，《地理學報》第42期，2005年12月，臺北市，頁49。）

14.林士桓，〈臺灣清代方志研究——以府、廳、縣志為例〉，新北市，國立臺北大學古典文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年，頁87、121、123-125。

15.高拱乾，《臺灣府志》，收入《臺灣歷史文獻叢刊》，南投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年，頁1-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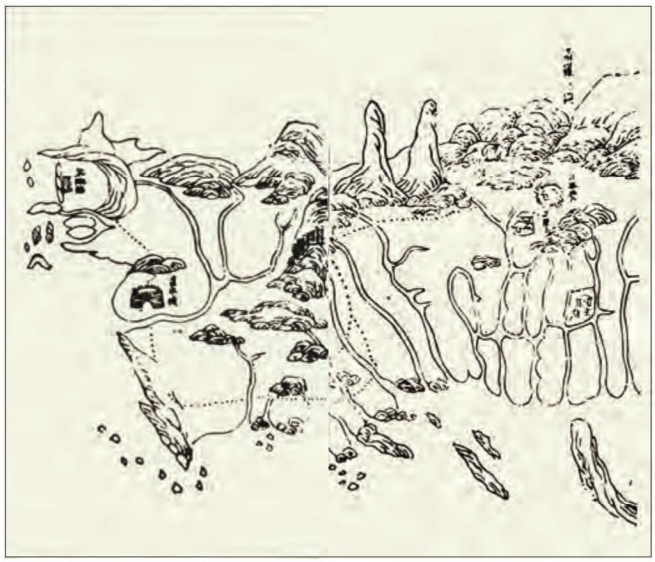


圖2　佚名畫家　諸羅縣圖　1694　（圖片來源：高拱乾，《臺灣府志》，「卷首」，收入《臺灣歷史文獻叢刊》，南投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年，頁12-13。）

圖3　佚名畫家　山川總圖（局部）　1717　（圖片來源：周鍾瑄，《諸羅縣志》，收入《臺灣歷史文獻叢刊》，南投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年，頁2-3。）

圖4　陳文鳴鐫刻　淡水廳全圖　1871　（圖片來源：陳桂培，《淡水廳志》，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一七二種，臺北市，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3年，頁2-3。）

臺灣美術館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治10年（1871）付梓的《淡水廳志》，所附《淡水廳全圖》（圖4）、《分圖一～四》、《沿山各隘圖一～二》、《沿海礁沙形勢圖一～二》等山川輿圖，[16]則以「計里畫方」搭配符號及文字繪製，並清楚標示東西南北方位和經緯度數，乃是17部方志中唯一現代式的輿圖。

臺灣方志編輯群，係為服務最高統治者而成立，修志官紳基於政治動機，集體進行轄區內封域、規制、秩官、武備、賦役、典秩、風土、藝文等之文本書寫，並命畫工繪刻視覺性輿圖。方志輿圖是以行政疆域為描繪對象，並採用傳統山水畫法描繪轄區山川形勢、政軍建置及聚落的分布概況。[17]其技法表現大抵粗拙、簡率，但政治性喻意極強。它們既是帝國標識臺灣納入版圖的象徵，更是作為國家主權與領土範圍的重要憑證。[18]

二、臺灣彩繪輿圖

清領時期，除了以木刻雕版印製方志輿圖之外，康、雍、乾盛世及光緒年間，也留下數種以手工彩繪的臺灣輿圖，分別為國內外博物館、圖書館所珍藏。[19]設色敷彩臺灣輿圖較諸木版印製方志輿圖，多了繪畫色彩的表現，因而有「景觀式的地理圖」、「山水畫式的地圖」或「彩繪本卷軸地圖」的稱呼。[20]

本章節選擇以《康熙臺灣輿圖》、《臺灣圖附澎湖群島圖》、《臺灣地圖》及《臺灣前後山全圖》4幅彩繪輿圖為視覺文本，嘗試探索清朝畫家描畫不同時期臺灣的動機與傳達的意涵。

（一）《康熙臺灣輿圖》——政軍建置與民、番風俗並重

大約製作於康熙38-43年（1699-1704）的《康熙臺灣輿圖》，[21]描繪臺灣西部從南到北，一府、三縣的衙署、營盤、汛塘等政軍建置節點。（圖5-1）澎湖、臺灣西部有幾條橫直的陸路營兵和水師巡哨的紅色防線。而北起「八里分社」，南至「沙馬岐頭」的虛線，則是人和牛車行走的南北縱貫大路。此地圖最特別之處為，描繪漢人與平埔族的風俗圖像。[22]從圖繪內容來看，《康熙臺灣輿圖》明確標示清初臺灣地理景觀與政軍設施，具有輿圖的實用功能；並將漢、番風俗與人文景觀入

16.陳桂培，《淡水廳志》，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172種，臺北市，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3年，頁1-17。
17.劉廷祥，《我國方志地圖研究：以明代方志地圖為例》，臺北市，花木蘭文化工作坊，2005年，頁42-45。
18.洪健榮，〈知識／權力的空間——清代臺灣方志輿圖中的政治文化意識〉，「空間新思維——歷史輿圖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臺北市，國立故宮博物院，2008年，頁323。
19.科技部，《科技大觀園》，「飛覽古今——從古輿圖看家園」，快取版，https://scitechvista.nat.gov.tw/zh-tw/PopularScience/C/8/10/1/237.htm（2018年7月8日瀏覽）
20.翁佳音、石文誠、陳佳慧，《康熙臺灣輿圖歷史調查研究報告》，臺北市，國立臺灣博物館，2007年，頁47、51、55。
21.此圖原存於清宮內府，明治35年（1902）輾轉入藏於臺灣總督府博物館（今國立臺灣博物館）。翁佳音等依據山中樵論述，將其製作年代訂於康熙38至43年之間。（翁佳音、石文誠、陳佳慧，《康熙臺灣輿圖歷史調查研究報告》，臺北市，國立臺灣博物館，2007年，頁15、26-27、39。）
22.翁佳音、石文誠、陳佳慧，《康熙臺灣輿圖歷史調查研究報告》，臺北市，國立臺灣博物館，2007年，頁50。

國立臺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圖5-1 佚名畫家 康熙臺灣輿圖（局部—臺灣府、臺灣縣部分） c.1699-1704 絹本彩繪 69×565公分（原圖） 國立臺灣博物館典藏 （圖片來源：國立臺灣博物館主編，《地圖臺灣——四百年來相關臺灣地圖》，臺北市，南天，2007年，頁168。）

圖5-2 康熙臺灣輿圖描繪平埔族的茅草屋，周圍栽植修竹。 （圖片來源：國立臺灣博物館主編，《地圖臺灣——四百年來相關臺灣地圖》，臺北市，南天，2007年，封面。）

圖。此種地圖與風景兼容的表現手法，是否受到16、17世紀歐洲地圖影響，尚待更詳細的比對與查證；[23]不過東、西方在表現風格上，還是各具特色。歐洲地圖上所描繪的建築、風俗或人物，幾乎都畫成小插圖（vignettes），具有濃烈的裝飾效果，目的在激發顧客的購買慾。然而《康熙臺灣輿圖》顯然強調的是采風紀實，因而圖面上出現的漢人村落，可見磚瓦建造的民宅、水田、旱田、牛車與馬匹。「紅毛樓」與「紅毛城」之間的海灣，船隻與牛車忙碌穿梭。平埔族的茅草屋，周圍栽植「椰樹」或「修竹」。[24]（圖5-2）而下淡水溪以南，大肚溪以北，則出現手執弓箭、標槍，追逐鹿群或野兔的平埔番人，其紀實意義顯然超過裝飾作用（圖6-1、圖6-2）。《康熙臺灣輿圖》是目前所知最早運用青綠設色及細膩筆法，生動地呈現17、18世紀更迭之際，臺灣山川地理與人文社會狀態的巨幅彩繪輿圖。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23.16、17世紀的歐洲地圖，如法蘭克福雕刻家特奧多雷・德・布里（Theodor de Bry, 1528-1598）1598年《澳門圖》，可能是歐洲人最早以中國城市為主題的地圖。《澳門圖》將宗教建築及城市居民搭船、捕魚、騎馬、坐轎等日常生活描繪入圖。英國製圖家約翰・斯皮德（John Speed, 1542-1629）1626年《中華帝國》（The Kingdome of China），及荷蘭地理學家威廉・布勞（Willem Blaeu, 1571-1638）1635年《亞洲圖》（Asia Nnoviter Delineata），也都在地圖上方描繪城市建築、港口風光、風俗人物，兩側還以穿著獨特民俗服飾的單一或成對男女作為圖面上的裝飾物。（以上諸圖，請參看蕭宗煌、呂理政統籌策劃，《艾爾摩莎：大航海時代的臺灣與西班牙》，臺北市，國立臺灣博物館，2006年，頁26；國立臺灣博物館主編，《地圖臺灣——四百年來相關臺灣地圖》，頁110；石守謙主編，《福尔摩沙——十七世紀的臺灣、荷蘭與東亞》，臺北市，國立故宮博物院，2003年，頁17。）

24.《臺灣府志》〈風土志〉云：「番屋高地四、五呎，深狹如舟形，梁柱皆畫五采；……後多植椰樹、修竹，暑氣莫能入」。（高拱乾，〈風土志〉，《臺灣府志》卷7，收入《臺灣歷史文獻叢刊》，南投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年，頁188。）

圖6-1　佚名畫家　康熙臺灣輿圖（局部—竹塹社、八里分社、雞籠社部分）　c.1699-1704　絹本彩繪　69×565公分（原圖）　國立臺灣博物館典藏　（圖片來源：國立臺灣博物館主編，《地圖臺灣——四百年來相關臺灣地圖》，臺北市，南天，2007年，頁168。）

圖6-2　康熙臺灣輿圖在下淡水溪以南，大肚溪以北，再現手執弓箭、標槍，追逐鹿群或野兔的平埔番人。　（圖片來源：國立臺灣博物館主編，《地圖臺灣——四百年來相關臺灣地圖》，臺北市，南天，2007年，頁168。）

圖6-3　康熙臺灣輿圖對後山噶瑪蘭社及傀儡番所在空間，以虛位手法再現，僅標註「在此山後」、「人跡不到」、「在此山後石洞內」等具有危險暗喻的文字。　（圖片來源：國立臺灣博物館主編，《地圖臺灣——四百年來相關臺灣地圖》，臺北市，南天，2007年，頁169。）

從內府流出來的《康熙臺灣輿圖》，[25]是由宮廷畫師所執筆。圖中標示了臺灣自然地形、行政兵備部署、巡哨防線、南北大路、民番聚落等重要政軍資訊，繪製目的是作為皇帝御覽及滿官擘劃治理新附版圖之用。圖上註記的文字皆採漢文楷書，不僅標誌地名，同時於地名左下方註記說明文字，內容比起一般方志輿圖更加詳實而豐富。此件彩繪輿圖和方志輿圖一樣，皆採上東、下西、左北、右南的橫軸圖式。但對後山噶瑪蘭社及傀儡番的所在空間，則以虛位手法再現。例如，標註「在此山後」、「人跡不到」、「在此山後石洞內」等具有危險暗喻的文字，（圖6-3）彰顯中央山脈另一邊為蠻荒化外之域。統治者選擇性地將後山番地劃為境外之地，不予定位，也不入圖。這種施以空白、隱藏或暗喻的手法，實具有視覺性的「高度象徵意涵」（highly metaphorical）。[26]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25.翁佳音、石文誠、陳佳慧，《康熙臺灣輿圖歷史調查研究報告》，臺北市，國立臺灣博物館，2007年，頁15。

26.Cordell D. K. Yee. "Concluding Remarks: Foundations for a Future History of Chinese Mapping." in J. B. Harley and David Woodward Ed., *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 Vol. 2, Book 2: Cartography in the Traditional East and Southeast Asian*.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228.

圖7　佚名畫家　臺灣圖附澎湖群島圖（局部—淡水營、大屯社、雞籠社）　c.1723-1735　紙本彩繪63×772公分（原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　（圖片來源：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故宮臺灣史料概述》，臺北市，國立故宮博物院，1995年，頁270。）

（二）雍正朝《臺灣圖附澎湖群島圖》——藝術化的紀實輿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臺灣圖附澎湖群島圖》，是目前所見面積最大的臺灣地圖。據莊吉發的考證，此圖大約製作於雍正元年至13年（1723-1735）間，[27]亦採上東、下西橫軸形式，左起基隆外海「花矸嶼」，右迄恆春半島「沙馬磯頭」。全圖以中央山脈西邊一府四縣之山川、官署、防汛、庄社為描繪重點，而未被畫入的東海岸，只在山峰上書寫「山後蛤仔難」、「山後卑南覓社」、「傀儡大山」等文字，標識著被帝國治權排除於山後的化外番界。

此圖最大的特點有二，一、1714年清廷在澎湖、臺灣進行履勘實測，繪圖者或許取得宮中詳實的測繪資料，因而增加許多澎湖群島及臺灣西海岸的山川與人文建置地名，因而且其方位與地點相對較為準確。二、臺北盆地以大湖形狀顯像，「雷里社」（今南萬華鄰新店溪）一帶，則註明「可泊大船」。這實為康熙33年（1694）臺北發生芮氏7級地震，土地瞬間液化，淡水河河水入侵盆地形成大湖的紀實圖像。[28]郁永河（1645-?）《裨海紀遊》即曾記載：「甲戌（1694）四月，地動不休，番人恐怖，相率徙去，俄陷為巨浸」。[29]故此圖以肖真的手法，再現當年地震所造成的地形變貌。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27.莊吉發，〈錦繡河山——臺灣輿圖的繪製經緯〉，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主編，《故宮臺灣史料概述》，臺北市，國立故宮博物院，1995年，頁3。
28.謝英宗，〈康熙臺北湖古地理環境之探討〉，《地理學報》第27期，2000年6月，臺北市，頁85-95。
29.郁永河，《裨海紀遊》，南投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4年，頁23。

本圖以傳統山水畫法繪製，大海、河流為淺綠色，海面以鱗狀波紋標示，河流以黑色雙線勾勒；西岸陸地以淡黃色敷染，近山用褐灰色暈染，中央山脈渲染為淺藍色，並以線條勾勒出山岳的外形；山頂及山麓再以層次井然的綠、黑色表現林木與植被的空間距離。原圖楷書秀逸，設色淡雅，用筆穩健，結構清晰，洵為清朝臺灣輿圖中藝術性表現甚高的紀實地誌圖。（圖7）

（三）乾隆朝《臺灣地圖》——盛世華麗山水畫輿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珍藏的另一件輿圖，乃乾隆時期的《臺灣地圖》。莊吉發考證其製作時間「當在乾隆中葉」，另一說則為乾隆21-24年（1756-1759）間。[30]此圖描繪中央山脈以西府城、縣城等行政建置，並呈現全臺山川形勢、道路里程、巡守塘汛和駐防營衛等防衛資訊。除了漢人庄、街、厝之外，已開墾田地標誌「田」字，就連平埔番及恆春半島部分瑯嶠生番社名及分佈情形，亦詳加註記與標示位置。至於山後「哈仔蘭三十六社」、「崇爻十二社」、「傀儡山生番二十七社」、「卑南覓生番七十二社」，以及內山「水沙連三十六社」等，則於畫面空白處，以楷體書寫社名及歸化時間，但並未在圖面上定位標識。顯示即使在18世紀中期乾隆盛世，宮廷畫師繪製輿圖時，依然視後山生番為未馴化的域外蠻民。而已歸化的後山、內山及南端兇猛生番，頂多也只在輿圖邊緣空白處以文字註明，實際上也沒有入畫標位。

此圖運用傳統線條與符號，標識並區分漢庄與番社、道鎮營盤與汛塘、海流與山岳。府城、縣城、竹塹城及大雞籠城等政軍設施，則依據歷史進程，或畫成竹牆，或畫成石造城牆。城內官署、廟宇及其他人文建築，則以符號、文字標示。全幅採山水畫法，臺江內海及淡水河則舟楫輻輳，並特別以線條勾勒填上鮮艷紅、黃色彩。全圖形塑出昇平盛世、華麗明亮的氛圍，再現為乾隆盛朝的政治地理圖像。（圖8）

（四）光緒朝《臺灣前後山全圖》——新納後山扭曲的認知空間

清朝治臺，採民／番分治、生番隔離的政策。雍正皇帝曾在官員奏摺上，硃批曰：「朕諄諄訓誨，但當劃清界限，使生熟番夷及內地百姓，各安生理，兩不相侵，始可免意外之虞」。[31]甚至標註可資辨識的「番界」線，以界碑、土牛堆、土

30.莊吉發，〈錦繡河山——臺灣輿圖的繪製經緯〉，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主編，《故宮臺灣史料概述》，臺北市，國立故宮博物院，1995年，頁4；國立故宮博物院研究者，則將此圖繪製時間定於「乾隆二十一至二十四年（1756-1759）年間」。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精選〉，http://theme.npm.edu.tw/selection/Article.aspx?sNo=04001051#inline_content_intro（2018年7月8日瀏覽）

31.此係雍正7年正月初三，臺灣吏科給事中赫碩色及監察御史夏之芳奏摺之後的硃批文字。參見雍正，《硃批諭旨》，四庫全書本，卷七十二，維基文庫，https://zh.m.wikisource.org/zh-hans/硃批諭旨_（四庫全書本）/卷072（2018年7月8日瀏覽）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圖8　佚名畫家　臺灣輿圖（局部—臺灣府）　c. 1756-1759　紙本彩繪　46×667公分（原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　（圖片來源：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精選〉，http://theme.npm.edu.tw/selection/Article.aspx?sNo=04001051，2018年7月8日瀏覽）

圖9　李聯琨　臺灣前後山全圖　c.1880　彩繪紙本　60×108公分　美國國會圖書館典藏　（圖片來源：中央研究院數位文化中心，〈數位方輿〉，http://digitalatlas.asdc.sinica.edu.tw/map_detail.jsp?id=A103000058，2018年7月8日瀏覽）

牛溝或望樓等設施，劃出不可逾越的民／番分界線。[32]我們從上述3件康、雍、乾臺灣輿圖，即可看出這種將內地遷徙漢民與本地生、熟番隔離，分層管理、劃界區隔的統治策略。將未歸順的臺灣生番族群排除於輿圖之外的作法，一直要到同治13年（1874）「牡丹社事件」爆發後，清廷才「放棄封山禁令，改為『開山撫番』」政策，[33]而後山番界才得以被置屯、設官、丈量並畫入輿圖中。

美國國會圖書館收藏的《臺灣前後山全圖》，是福建候補同知李聯琨奉巡撫李明墀（1823-1886）之命，赴臺考查「新設府廳縣城」、「新開后山南北中三路」，以及「瑯嶠之恆春縣等處之地名」後所畫。根據圖上李聯琨的述言：「隨山履勘，深入不毛之地五十餘日，日有筆記。其未經之處，或照各營錄報，或詢諸曾經該地之人。按地增入圖中」。[34]足見李聯琨繪製此圖時並未全部履勘，故對實質環境的掌握，仍有「主觀」、「不完整」、「扭曲」的空間認知。[35]

此圖完成時間大約在光緒6年（1880），原圖標示二府（臺灣、臺北）、八縣、四廳、澎湖列島和周邊島嶼的地理位置，以及城鎮村社的分佈情況。[36]中央山脈因仍缺乏履勘資料，故依舊採空白呈現。東西沿海及島嶼，則以文字註記水路里程、港灣、地形險要及民情土俗等概況。圖中道路以紅色虛線標誌，山脈、河川以符號標示；山峰淡染藏青色，陸地渲染淺絳色，河流及海岸則以橄欖綠著色，整體表現沉著典雅的色感。（圖9）

李聯琨的述言，此圖的製作乃肇因於「海上兵事」（指「牡丹社事件」），而臺灣為「聖澤涵濡」的「荒服地」，坐擁「東南海防」咽喉，「足以牽制東洋各國」，故綜覈履勘，繪製成《臺灣前後山全圖》。李氏的自敘反映出，晚清時期在外邦競逐下，為了彰顯「臺灣全島莫非王土」的一統意識，[37]因而此圖特別著重於描繪新設府縣廳城，新開後山港灣，以及周圍海島等具有行政或海洋戰略地位的節點。然而實際核對原圖，其標示的地標、路徑或地理位置甚為簡略，並出現不少錯誤與偏差的認知空間。

國立臺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32.石文誠，〈帝國的邊陲論述——以清代臺灣圖像為例〉，《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館刊》，創刊號，2010年10月，臺南，頁23。

33.賴進貴、黃清琦、葉高華，〈古地圖的空間認知探索——以1878年《全臺前後山輿圖》為例〉，《地理學報》第42期，2005年12月，臺北市，頁53。

34.《臺灣前後山全圖》上面有李聯琨以楷書書寫繪圖的原因、內容等文字。參見中央研究院數位文化中心，〈數位方輿〉，「主題單元」，『地方行政區圖』，《臺灣前後山全圖》，http://digitalatlas.asdc.sinica.edu.tw/map.jsp?id=A103000058（2018年7月8日瀏覽）

35.同註33，頁52。

36.中央研究院數位文化中心，〈數位方輿〉，「主題單元」，『地方行政區圖』，《臺灣前後山全圖》，http://digitalatlas.asdc.sinica.edu.tw/map.jsp?id=A103000058（2018年7月8日瀏覽）

37.李聯琨於輿圖右側旁註中，對主要地標、節點、地方民俗，以及製圖的緣起、功能、過程和效用都詳實地以文字敘述說明。

三、小結

畫工印製的黑白木刻方志輿圖和《臺灣前後山全圖》，多以樹木、波浪、線條等標誌符號，搭配說明性文字，標示出與時並進的行政轄區之山川、政軍設施和聚落的現況，清楚地界定了清朝地方行政權力與教化所及的有效範圍。宮廷畫家所畫的大型長卷彩繪輿圖，則將臺灣自然地景、政軍建置及民俗生活圖像化，呈現出活潑生動的地誌圖。紀實性強烈的彩繪輿圖，既具有施政參考的實用性，又擁有供人鑑賞的藝術性之雙重功能。由於彩繪輿圖分別是在不同皇帝時期所繪製的全臺性地誌圖，因而被賦予再現帝國領土範疇與治權實質擴張的政治象徵意涵。

叁、18世紀現代測繪的臺灣輿圖

中國地圖學從西晉裴秀（224-271）創制「六法」原則後，一直到明嘉靖年間羅洪先出版《廣輿圖》，才將輿圖的發展推至巔峰。[38]明萬曆12年（1584），耶穌會教士利瑪竇（1552-1610）應嶺西按察司副使王泮之求，翻刻刊印《山海輿地全圖》；[39]不但開啟中國對「地圓說」及世界地理的認識，同時也將西洋科學製圖技術傳入中國。[40]清朝時期，康、雍、乾三朝都曾進行全國疆域領土履勘測繪。康熙首開聘任擅長天文觀測、三角測量法[41]及梯形投影法製圖技術的西洋傳教士，[42]遠赴內地18省、東北地區及邊疆藩部，進行大地測量，並完成《皇輿全覽圖》的繪製。當時滿清官員與西洋傳教士所組成的測量隊，也曾渡海到澎湖、臺灣進行實地履勘與測繪。這是自17世紀荷蘭、西班牙之後，西方人再度以現代製圖技術勘丈、繪製臺灣地圖。

耗時將近10年，結合大批中外人員完成的《皇輿全覽圖》，日後成為雍正、乾隆全國輿圖擴充版的參考根據。而臺灣方志中，也屢次提及此次的地理測繪。以下將藉由分析《皇輿全覽圖》的測繪目的、法國耶穌會士來臺測繪、輿圖文本的西傳，以及臺灣在《皇輿全覽圖》與西方輿圖中的再現等議題，探討臺灣地圖在《皇輿全覽圖》發展系脈所蘊藏的多重意涵。

一、《皇輿全覽圖》的測繪目的

康熙是清朝第一位主持全國輿圖測繪的皇帝。他於《皇輿全覽圖》初版刊印後

38.張哲嘉，〈明代方志中的地圖史料〉，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演講稿，http://project.ncnu.edu.tw/jms/wp-content/uploads/2015/10/report2003ChangCC.pdf（2018年7月8日瀏覽）

39.郝曉光、呂健、薛懷平、覃文中，〈《山海輿地全圖》的復原研究〉，《同濟大學學報》第29卷第10期，2001年10月，上海，頁1159-1160。

40.同註38。

41.康熙朝西洋傳教士運用三角測量法進行全國國土測量時，使用了望遠鏡、象限儀、半圓儀、比例尺等科學儀器，完成1:1,400,000比例的《皇輿全覽圖》及各省區分圖的繪製。之後這些現代化的測量儀器，則被陳列在養心殿、暢春園等皇室寢宮及御所中。（潘吉星，《中外科學之交流》，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3年，頁447-448。）

42.孫詰，《康雍乾時期輿圖繪製與疆域形成研究》，北京市，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頁265。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第3年（1720）說：

> 朕於地理，從幼留心，凡古今山川名號，無論邊徼遐荒，必詳考圖籍，廣詢方言，務得其正，故遣使臣至崑崙西番諸處。凡大江、黃河、黑水、金沙、瀾滄諸水發源之地，皆目擊詳求，載入輿圖。[43]

《皇輿全覽圖》的製作固然與康熙個人對地理學的熱中有關，而康熙28年（1689）中俄簽訂「尼布楚條約」，康熙深刻體悟到中國對東北地區地理知識的匱乏，更促使他決心以科學實測方法勘丈、繪製大清版圖。[44]康熙36年（1697）準部噶爾丹平定後，聖祖於47年（1708）諭令西洋傳教士及官員，攜帶儀器分赴東北、蒙古及內地各省進行測量。同時咨文各省督撫、將軍及地方官員，提供測量團隊的需求。[45]當時清廷派遣法國傳教士白晉（Joachim Bouvet, 1656-1730）、雷孝思（Jean Baptiste Régis, 1663-1738）、杜德美（Pierra Jartoux, 1668-1720）及日爾曼神父費隱（Xavier-Ehrenbert Fridelli, 1673-1743）等人，分赴各地進行履勘與測繪，[46]完成的草圖則由當地巡撫指派專人送至皇帝所在之地，以俾天子能掌控整個繪製過程與成果。[47]

在康熙皇帝的策畫與指揮下，《皇輿全覽圖》終於康熙56年（1717）完成木版初刻本，共計有總圖1幅，分省和地區圖28幅。[48]英國學者李約瑟（Noel Joseph Terence Montgomery Needham, 1900-1995），稱譽此圖是：「亞洲當時所有地圖中最好的一幅，而且比當時所有歐洲地圖都更好、更精確」。[49]（圖10）德國漢學家傅吾康（Franke Wolfgang, 1912-2007）則說：「直至今日，東方地圖之繪製及出版，都還是用這份地圖作依據」。[50]可見康熙皇帝所推動的全國輿圖測繪工程，不但藉由現代天文、曆算、數學等專業知識，確立大清帝國的疆界與國土。同時也透過版圖的界定，以及北京本初子午線的設定等「視覺性」建制，傳遞中國乃東方陸權盟主，足以和西方海權國家抗衡的政治象徵意涵。

二、1714年法國耶穌會士來臺測繪

17世紀晚期臺灣被納入清朝版圖並隸屬於福建省。首次全國性輿圖測繪，當然必須克服險惡海象、渡洋履勘，以宣示對斯土斯民的統轄權。那麼是誰渡過黑水溝來臺實地測勘呢？

43.覺羅勒德洪等總裁，《聖祖仁皇帝實錄》卷290，康熙59年11月辛巳，頁2b-3a；引自李孝聰，〈記康熙《皇輿全覽圖》的測繪及其版本〉，《故宮學術季刊》第30卷第1期，2012年秋季，臺北市，頁77。

44.同註42，頁30。

45.潘吉星，《中外科學之交流》，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3年，頁446。

46.李孝聰，〈記康熙《皇輿全覽圖》的測繪及其版本〉，《故宮學術季刊》第30卷第1期，2012秋季，臺北市，頁57。

47.同上註，頁65。

48.同註46，頁72。

49.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第5卷第1分冊，北京市，科學出版社，1976年，頁235。

50.Franke Wolfgang著，胡儁吟譯，〈評《康熙皇輿全覽圖研究》〉，《明清史國際學術研討論會論文集》，天津市，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頁672；引自潘吉星，《中外科學之交流》，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3年，頁447、453。

國立臺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臺灣方志中對皇朝派人來臺測繪，時有提及。《諸羅縣志》（1717）〈封域志〉曰：「欽差大人繪畫地圖，勘丈里數」，又說：「茲卷或躬親遊歷、或遣使繪圖」。[51]《重修鳳山縣志》（1764）云：「按康熙五十三年，上命大人涉波濤、歷險阻，親按地形，勘定疆界，輿圖已登天府」[52]；《續修臺灣縣志》（1807）則說：「康熙五十五年欽差丈量」[53]。上述方志中，對來臺勘丈繪圖者，僅稱「欽差大人」、「使」、「大人」、「欽差」，並未明確記載人名。方豪1949年撰寫〈康熙五十三年測繪臺灣地圖考〉一文，引用馮秉正（Moyriac de Mailla, 1669-1748）1715年8月從江西寫給寇羅尼亞（P, de Colonia）神父的信，[54]信中馮秉正提及他和「雷孝思、德瑪諾（Romain Hinderer, 1668-1744）」在「一七一四年四月三日」，由「皇帝領派的四位滿官」伴隨，從「廈門上船」，並在「十五艘戰船」護送下，航經金門、澎湖群島，[55]最後於4月16日中午「駛進臺灣港」。之後，「整整化（花）了一個月的時間以測繪這島上屬於中國部分的地圖」。[56]方豪因此主張，來臺測繪的「欽差大人」是雷孝思、馮秉正及德瑪諾3人。[57]他們於1714年4月16日搭船進入臺灣（安平）港，之後花了一個月的時間，測繪「屬於中國部分」，但「東部只有蕃人居住：那地方多山，沒有開墾，並且野蠻」，[58]故測繪隊伍並未越界勘查，而輿圖最後則採留白方式呈現。

李孝聰引用江寧巡撫張伯行康熙52年（1713）奏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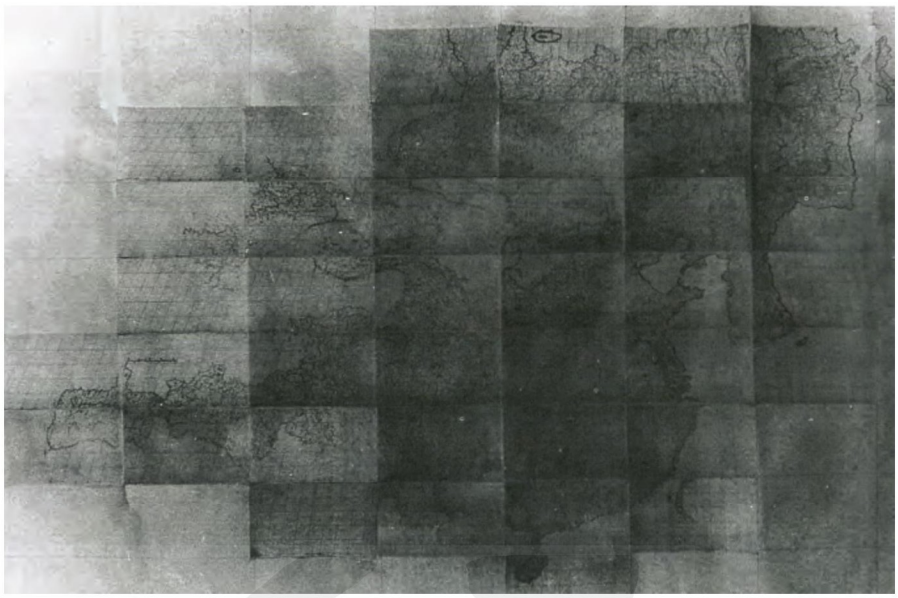
> 康熙伍拾貳年伍月拾柒日，准兵部咨，奉旨往河南、江南畫輿圖去的官，拜唐阿、西洋人不必回來，就從彼處往浙江周（舟）山等處、福建臺灣等處畫去。[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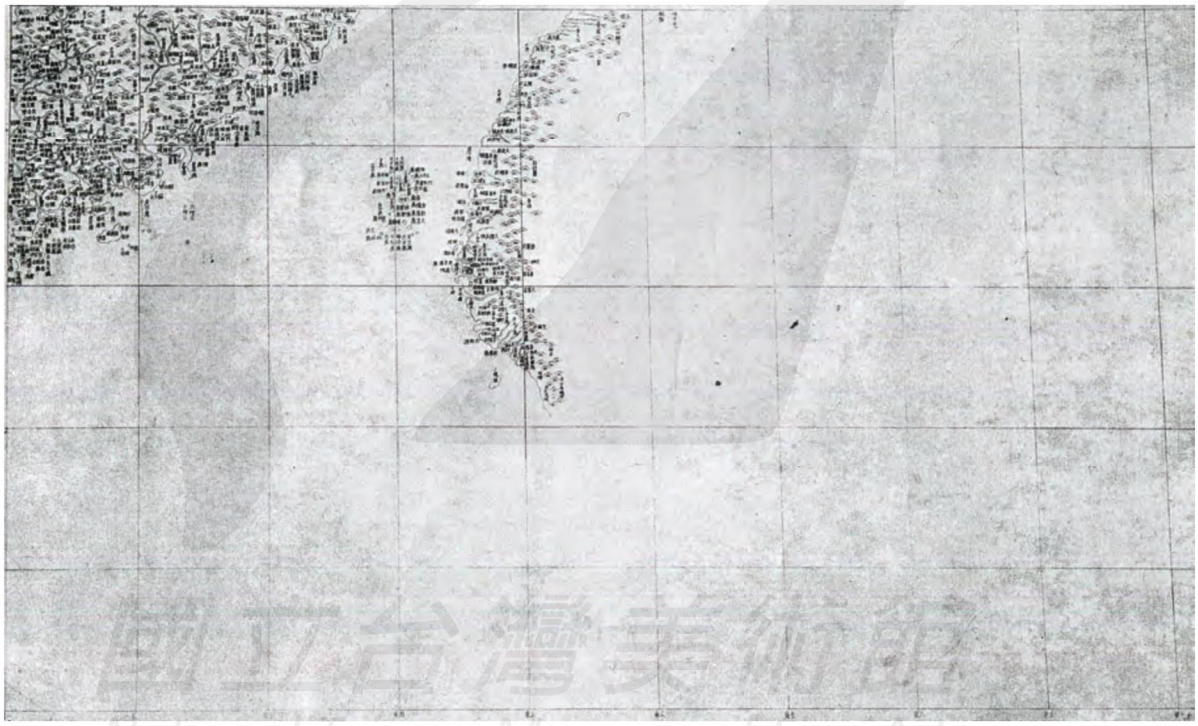
說明完成「河南、江南」輿圖測繪後的雷孝思、馮秉正及德瑪諾3人，[60]隨即馬不停蹄和滿清執事人員「拜唐阿」，[61]前往浙、閩、臺進行勘繪。綜合馮秉正信函，以及《天下輿圖總摺》說：「康熙五十三年九月二十日，奉旨交來有度數福建全省圖一張」[62]來看，3位法國耶穌會士大約是在1714年潤5月中下旬完成臺灣履勘測繪，隨即將臺灣與福建合併謄繪為地圖，並於同年9月20日之前上呈福建省全圖。（圖11）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51.周鍾瑄，《諸羅縣志》，卷1，〈封域志〉，南投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年，頁6、17。
52.王瑛曾，《重修鳳山縣志》卷1，〈輿地志〉，南投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年，頁8。
53.謝金鑾，《續修臺灣縣志》卷1，〈地志〉，收於《臺灣文獻叢刊》第140種，臺北市，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年，頁27。
54.方豪，〈康熙五十三年測繪臺灣地圖考〉，國家圖書館藏「羅剛教授遺書」抽印本，1949年，頁38。
55.同上註，頁39-40。
56.同註54，頁41。
57.同註54，頁31。
58.同註54，頁42。
59.李孝聰，〈記康熙《皇輿全覽圖》的測繪及其版本〉，《故宮學術季刊》第30卷第1期，2012秋季，臺北市，頁59。
60.同上註，頁64。
61.「拜唐阿」是滿文譯名，有執事人之意。（杜家驥、李然，《嘉慶事典：清史事典7》，臺北市，遠流，2006年，頁90。）
62.李孝聰，〈記康熙《皇輿全覽圖》的測繪及其版本〉，《故宮學術季刊》第30卷第1期，2012秋季，臺北市，頁60。

圖10　白晉繪製　馬國賢鐫刻　皇輿全覽圖　1717　瀋陽故宮　1929年石印本　（圖片來源：曹婉如、鄭錫煌、黃盛璋等編，《中國古代地圖集（清代）》，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年，第153圖，無頁碼。）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圖11　蔣友仁（Michel Benoist）繪製　乾隆十三排圖局部（福建沿海及臺灣）　1761　北京故宮博物院典藏　（圖片來源：曹婉如、鄭錫煌、黃盛璋等編，《中國古代地圖集（清代）》，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年，第170圖，無頁碼。）

三、《皇輿全覽圖》的西傳

《皇輿全覽圖》木刻初版於1717刊印，但方豪認為銅版輿圖是義大利傳教士馬國賢（Matteo Ripa, 1682-1746）1724年返歐後所雕。[63]而白鴻葉、李孝聰則根據馬國賢回憶錄，認為他是在康熙1719年的諭令下，依據測繪原圖製作44塊銅版，最後再拼接印製成完整的中國地圖。[64]杜赫德（Jean-Baptiste Du Halde, 1674-1743）所編纂《中國帝國和蒙古地理、歷史、編年史、政治與自然情況的概述》一書，附有《中國總圖》、《中國與中國韃靼及西藏總圖》（圖12）和15幅中國省圖，則是商請法國知名製圖師唐維爾（Jean Baptiste Bourguignon d'Anville, 1697-1782），參考《皇輿全覽圖》雕印。[65]此書於1734年在巴黎出版，3年後（1737）唐維爾又增補歐洲人東來亞洲沿途所記資料，修訂成《中國、蒙古與西藏新地圖》（*Nouvel Atlas de la Chine, de la Tartarie chinoise et du Thibet*）於海牙出版。[66]日後歐洲印製或出版中國全圖、區域圖或分省圖，大抵都是依據唐維爾的地圖重製。換言之，1708至1717年西洋傳教士為大清帝國履勘繪製的《皇輿全覽圖》，乃成為18世紀歐洲人繪製東方海、陸輿圖的基準範本。

四、《皇輿全覽圖》與18世紀西方輿圖再現的臺灣

《皇輿全覽圖》一反方志、彩繪輿圖常用的上東、下西橫軸圖式，改採上北、下南直軸形式。臺灣被畫在福建省東南沿岸外海，依緯度高低，從北至南標示出西半部重要的行政衙門、平埔番社及古城堡所在位置。西洋耶穌教士足跡未到的東部海岸則留白。山岳與河流以符號標誌，僅最重要的河川標示出名稱，而山岳也只有標幟大岡山、小岡山、木岡山及傀儡山，其他山岳則省略不刊印名稱。《皇輿全覽圖》雖然標榜，運用現代科學測量技術勘丈測繪全國性大地與各省行政轄區。但受限於清朝的治權，許多化外邊區，如：臺灣東部後山，以及西藏、新疆、貴州及廣西等地，西洋傳教士並未入境履勘，因而全覽圖中存在許多空缺。這些留白的地帶，在雍正實行「改土歸流」，乾隆平定準噶爾叛亂之後，西北、西南地區方陸續進行丈測，並於繪製《雍正十排圖》、《乾隆十三排圖》時增補，才讓擴張中的大清帝國版圖愈來愈完整。[67]但臺灣東部一直到帝國晚期，依然處於不完整、被扭曲的認知空間。（圖13）

63.方豪，《中西交通史》，長沙，嶽麓書社，1987年，頁865、868；引自劉亞軒，〈清初來華傳教士馬國賢與中西美術交流〉，融匯島，http://rhd361.com/special/news?id=7de4f06919374d089bd87e3c12a89feb（2018年7月8日瀏覽）

64.白鴻葉、李孝聰，《《皇輿全覽圖》的繪製》，北京，國家圖書館，2014年，頁77。

65.韓昭慶，〈康熙《皇輿全覽圖》與西方對中國歷史疆域認知的成見〉，《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6期，2015年，北京市，頁131-132。

66.李孝聰，〈記康熙《皇輿全覽圖》的測繪及其版本〉，《故宮學術季刊》第30卷第1期，2012秋季，臺北市，頁78；*Nouvel Atlas de la Chine, de la Tartarie chinoise et du Thibet*（中國、蒙古與西藏新地圖）,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法國國家圖書館）, http://gallica.bnf.fr/ark：/12148/btv1b53096745m（2018年7月8日瀏覽）

67.韓昭慶，〈康熙《皇輿全覽圖》與西方對中國歷史疆域認知的成見〉，《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6期，2015年，北京市，頁123、130、136-137。

圖12　Jean Baptiste Bourguignon D'Anville（唐維爾）　Carte la Plus Générale et qui Comprend la Chine, la Tartarie Chinoise et le Thibet（中國與中國韃靼及西藏總圖）　1734　引自Jean-Baptiste Du Halde（杜赫德）, Description Géographique, Historique, Chronologique, Politique 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中國帝國和蒙古地理、歷史、編年史、政治與自然情況的概述）（圖片來源：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File:CEM-44-La-Chine-la-Tartarie-Chinoise-et-le-Thibet-1734-2568.jpg，2018年8月25日瀏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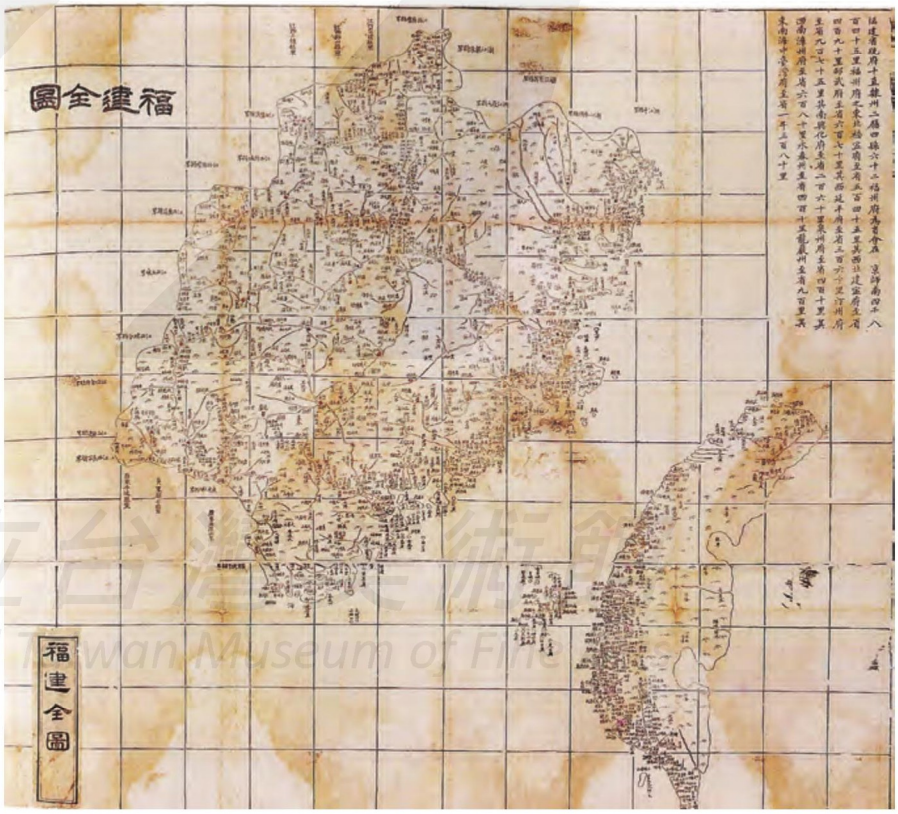


圖13　佚名畫家　福建全圖　c.1862-1863　79×71.8公分　秋惠文庫收藏　（圖片來源：國立歷史博物館編輯委員會，《美麗之島──臺灣古地圖與生活風貌展》，臺北市，國立歷史博物館，2003年，頁63。）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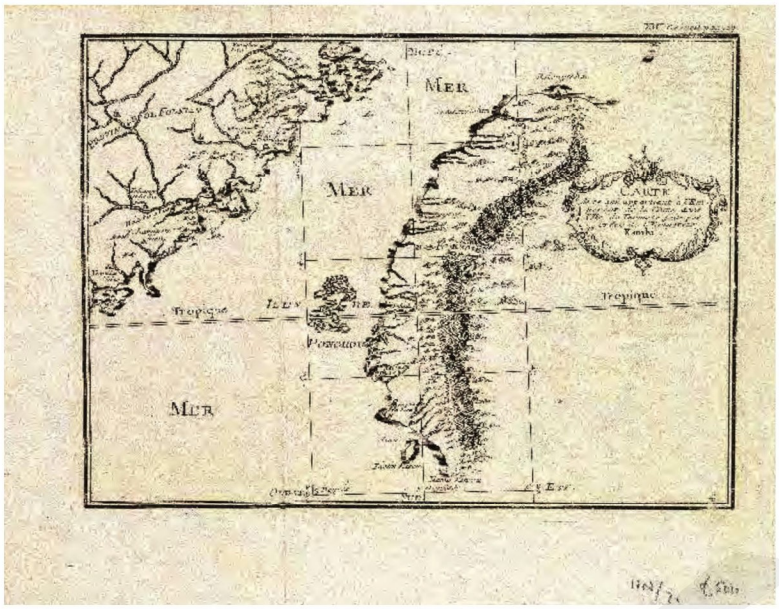


圖14　馮秉正　康熙皇帝命令下實測中華帝國隸屬下之臺灣地圖（收錄於1720年刊行《耶穌會士書簡集》14卷19頁）　1720　20.7×16.3公分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典藏　（圖片來源：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提供）

圖15　Jean Baptiste Bourguignon D'Anville（唐維爾）Province de Fo-kien（福建省圖）　1737　原刊印於Jean Baptiste Bourguignon D'Anville（唐維爾）, *Nouvel Atlas de la Chine, de la Tartarie chinoise et du Thibet*（中國、蒙古與西藏新地圖）　（圖片來源：Gallica（法國國家圖書館），http://gallica.bnf.fr/ark:/12148/btv1b53096745m/f29.item，2018年7月8日瀏覽）

圖16　瓦倫第恩（Francois Valentijn）繪圖　J. van Braam及G. Onder de Linden（荷蘭出版商）　Kaart van het Eyland Formosa en de Eylanden van Piscadores（福爾摩沙島與漁翁群島圖）　1726　62.1×47.5公分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典藏　（圖片來源：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提供）

國立臺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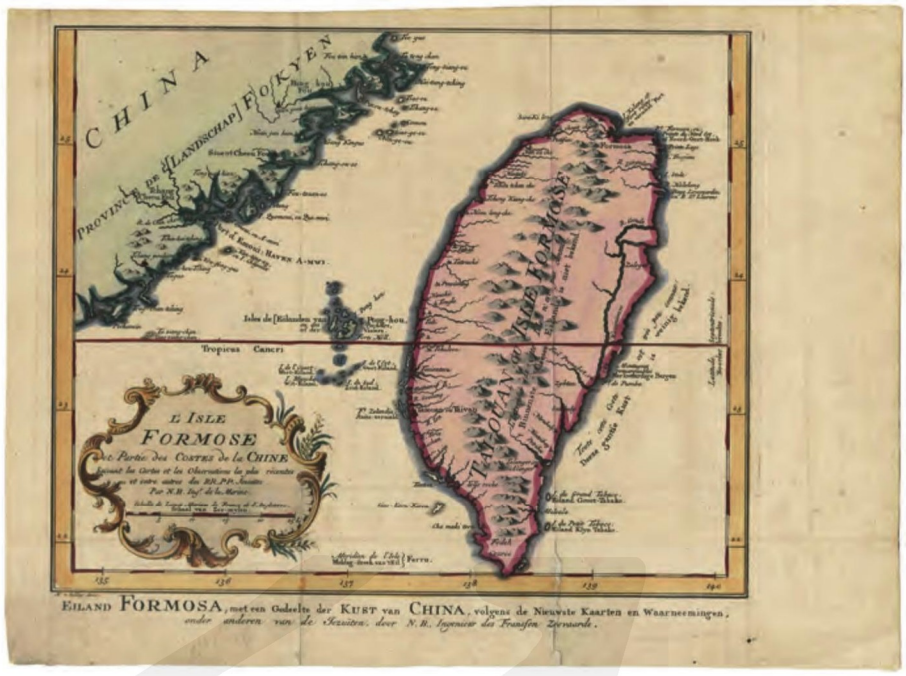


圖17　貝林（Jacques Nicolas Bellin，法國海軍製圖師）　L'Isle Formose et Partie des Costes de la Chine（福爾摩沙島與中華沿海局部圖）　c.1749-1760　36.3×27.1公分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典藏（圖片來源：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提供）

18世紀西方製圖師繪製臺灣地圖時，若承襲《皇輿全覽圖》系統，幾乎都用簡略方式呈現。例如馮秉正帶回歐洲的《康熙皇帝命令下實測中華帝國隸屬下之臺灣地圖》，只用法文標識幾個府、縣、古城堡、澎湖群島及小琉球等重要節點。中央山脈標示「limites」（界線），山脈以東則空缺不畫，象徵該地是帝國治權未逮之區。（圖14）杜赫德編輯的書及唐維爾在海牙出版的書，福建省圖中的臺灣（圖15），也都依據《皇輿全覽圖》的模式虛化臺灣東海岸。

然而18世紀部分歐洲地圖繪製者，也有不同的作法。例如，荷蘭牧師瓦倫第恩（Francois Valentijn, 1662-1727）《新舊東印度誌》（*Oud en Nieuw Oost-Indiën*）的《福爾摩沙島與漁翁群島圖》；[68]（圖16）荷蘭製圖師約翰尼斯二世・范・克倫（Johannes II van Keulen, 1704-1755）繪製的《廣東、福建與福爾摩沙島》海圖；[69]法國海軍製圖師貝林（Jacques Nicolas Bellin, 1703-1772）繪製的《福爾摩沙島與中華沿海局部圖》（圖17）等。這些以航海為目的世界地圖，描繪臺灣西部時，重要地標與河流乃參考1717年法國傳教士測繪圖；但對「所知甚少」的東岸，則參酌17世紀荷、西人的測繪圖，將東半部原本空缺的河流、島嶼及地名標示出來。[70]這些18世紀歐洲人繪製的臺灣海圖，共通特色是將秀姑巒溪口哆囉滿（Toloman）一帶畫成3個上下相鄰小島。[71]可見即使測繪資料不完整或不完全準確；但為了符合航

68.呂理政、魏德文主編，《經緯福爾摩沙——16-19世紀西方繪製臺灣相關地圖》，臺北市，南天，2006年，頁83。
69.同上註，頁87。
70.同註68，頁89。
71.同註68，頁101。

國立臺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海需求，西方製圖師仍參酌前一世紀歐洲臺灣統治者的測繪圖，再現福爾摩沙的地理形貌。

五、小結

耗費10年完成的《皇輿全覽圖》，三位法國耶穌會士花了1個月時間，踏勘納入清朝版圖已30年的臺灣西半部及澎湖群島。至於未開墾且野蠻的東半部，測量隊伍並未涉足。我們從雷孝思、馮秉正、德瑪諾測繪的《福爾摩沙島圖》、唐維爾的《福建省圖》及貝林的《福爾摩沙島與中華沿海部分圖》等，可以看出受《皇輿全覽圖》影響的歐洲製圖師，都以準確但擇要的紀實手法，呈現治權所及的臺灣西邊及澎湖群島。至於治權未逮、未經履勘的東半部，歐洲製圖師或遵循《皇輿全覽圖》採留白法，以暗示地圖外的東部乃為教化未及的蠻荒之域；或參考前一世紀荷、西測繪圖，將臺灣東部再現為真實與想像合併的地圖。整體來看，歐洲製圖師所繪製的臺灣地圖，其地理資訊都皆甚為精準、簡要，但對實際山川、政軍及聚落等地理誌內容的轉譯，則不如方志輿圖及彩繪輿圖來得豐富而充實。

肆、結論

17世紀初期，中國東北地區的狩獵民族女真人入主中原建立大清帝國。之後歷經兩百多年的繁盛，於19世紀初期漸趨衰頹。康、雍、乾三朝（1662-1795）是滿清帝國向外擴張，國勢最為強盛的黃金年代。隨著開疆闢土諸多戰役的展開，以及統治政權的向外拓展，繪製地圖乃能釐清疆域，並具體標誌出皇清帝權管轄的範疇。而結合政治與文化所建構的「視覺性」體制，亦藉由二度空間的輿圖，再現帝國輝煌的統治功勳。

17世紀晚期臺灣被納入大清帝國版圖，之後地方統治官員及中央統治中樞，相繼運用傳統木刻墨印方志輿圖、彩繪卷軸輿圖及現代經緯輿圖，顯影東南海隅被「馴化」的荒陬邊區。在開拓疆土的歷程中，大清統治者除了以見聞錄、遊記、方志等文本，記錄臺灣的自然地理與人文景觀；並命令輿圖繪製者，運用文字、符號、圖案、留白及山水畫等各式技法，分類、標示、再現臺灣前山與後山的「馴化」程度。同時巧妙地在各種地圖的繪製中，區劃疆域的內／外，將統治者主體的想像與權力慾望轉化為圖面中蘊含象徵的意涵。誠如鄧津華所論，這種地理再現是一種「文本紀錄」和「親眼見證」的「雙重權威結構」。[72]在清廷運用輿圖繪製系

72.鄧津華，《臺灣的想像地理：中國殖民旅遊書寫與圖像（1683-1895）》，臺北市，臺大出版中心，2018年，頁61。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統所形塑的知識／權力結構中，被視為蠻荒邊境的臺灣，只是帝國主體「凝視」(gaze)下的客體「他者」(other)。[73]帝國統治者集體通過視覺器官，親眼凝視新附的領土，將親眼看見的屬民、自然空間及人文景物盡收眼底，並刻意區分為轄域內與外的地誌圖。效忠於帝國的製圖者，透過諮詢、想像或親身履勘，製造出各式的臺灣輿圖，賦予海疆臺灣多重的象徵意涵。滿清皇朝則以支配者之姿，操控「視覺性」建制的輿圖，將被「客體化」、「差異化」的臺灣予以收編、定義和再現。

參考書目

中文論著

方豪，〈康熙五十三年測繪臺灣地圖考〉，國家圖書館藏「羅剛教授遺書」抽印本。

王必昌等編，《重修臺灣縣志》，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113種，臺北市，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年。

王瑛曾，《重修鳳山縣志》，南投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年。

王庸，《中國地圖史綱》，北京市，商務印書館，1959年。

白鴻葉、李孝聰，《《皇輿全覽圖》的繪製》，北京，國家圖書館，2014年。

石文誠，〈帝國的邊陲論述——以清代臺灣圖像為例〉，《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館刊》創刊號，2010年10月，臺南，頁8-31。

石守謙主編，《福尔摩沙——十七世紀的臺灣、荷蘭與東亞》，臺北市，國立故宮博物院，2003年。

呂理政、魏德文主編，《經緯福爾摩沙——16-19世紀西方繪製臺灣相關地圖》，臺北市，南天，2006年。

李孝聰，〈記康熙《皇輿全覽圖》的測繪及其版本〉，《故宮學術季刊》第30卷第1期，2012秋季，臺北市，頁55-85。

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第5卷第1分冊，北京市，科學出版社，1976年。

周鍾瑄，《諸羅縣志》，收入《臺灣歷史文獻叢刊》，南投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年。

吳密察、賴進貴、莊永明等著，〈地圖與臺灣——四百餘年來的臺灣地圖史〉，國立臺灣博物館主編，《地圖臺灣——四百年來相關臺灣地圖》，臺北市，南天，2007年，頁2-35。

73.羅秀美編著，《隱喻．記憶．創意：文學與文化研究新論》，臺北市，萬卷樓，2010年，頁44-47。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林士桓，〈臺灣清代方志研究——以府、廳、縣志為例〉，新北市，國立臺北大學古典文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年。

林天人，〈地圖——權力的視野、想像的空間〉，《故宮文物月刊》第304期，2008年7月，臺北市，頁10-17。

洪健榮，〈知識／權力的空間——清代臺灣方志輿圖中的政治文化意識〉，《空間新思維——歷史輿圖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臺北市，國立故宮博物院，2008年，頁319-340。

郝曉光、呂健、薛懷平、覃文中，〈《山海輿地全圖》的復原研究〉，《同濟大學學報》29卷10期，2001年10月，上海，頁1159-1161。

高拱乾，《臺灣府志》，收入《臺灣歷史文獻叢刊》，南投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年。

夏黎明，〈國家統治與知識生產：清代台灣地圖的繪製與區域發展〉，《海峽兩岸臺灣史學術研討會論文》，廈門，廈門大學，2004年，頁117-139。

孫喆，《康雍乾時期輿圖繪製與疆域形成研究》，北京市，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

翁佳音、石文誠、陳佳慧，《康熙臺灣輿圖歷史調查研究報告》，臺北市，國立臺灣博物館，2007年。

國立歷史博物館編輯委員會，《美麗之島——臺灣古地圖與生活風貌展》，臺北市，國立歷史博物館，2003年。

莊心俞，〈清代宮廷畫家徐揚（1712～1779 尚存）筆下之乾隆武功〉，桃園市，國立中央大學藝術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4年。

莊吉發，〈錦繡河山——臺灣輿圖的繪製經緯〉，收入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主編，《故宮臺灣史料概述》，臺北市，國立故宮博物院，1995年，頁1-16。

陳桂培，《淡水廳志》，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172種，臺北市，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3年。

曹婉如、鄭錫煌、黃盛璋等編，《中國古代地圖集（清代）》，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年。

潘吉星，《中外科學之交流》，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3年。

國立臺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鄧津華，《臺灣的想像地理：中國殖民旅遊書寫與圖像（1683-1895）》，臺北市，臺大出版中心，2018年。

劉廷祥，《我國方志地圖研究：以明代方志地圖為例》，臺北市，花木蘭文化工作坊，2005年。

盧德嘉，《鳳山縣采訪冊》（一），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73種，臺北市，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年。

賴進貴、黃清琦、葉高華，〈古地圖的空間認知探索——以1878年《全臺前後山輿圖》為例〉，《地理學報》第42期，2005年12月，臺北市，頁47-68。

蕭宗煌、呂理政統籌策劃，《艾爾摩莎：大航海時代的臺灣與西班牙》，臺北市，國立臺灣博物館，2006年。

艾瑞克・霍布斯邦（Eric John Ernest Hobsbawm）著，黃煜文譯，《論歷史》，臺北市，麥田，2002年。

謝金鑾，《續修臺灣縣志》，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140種，臺北市，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年。

謝英宗，〈康熙臺北湖古地理環境之探討〉，《地理學報》第27期，2000年6月，臺北市，頁85-95。

韓昭慶，〈康熙《皇輿全覽圖》與西方對中國歷史疆域認知的成見〉，《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6期，2015年，北京市，頁123-142。

羅秀美編著，《隱喻・記憶・創意：文學與文化研究新論》，臺北市，萬卷樓，2010年。

吉莉恩・蘿絲（Gillian Rose）著，王國強譯，《視覺研究導論——影像的思考》（*Visual Methodologie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Interpretation of Visual Materials*），臺北市，群學，2006年。

外文論著

Yee, Cordell D. K.. "Concluding Remarks: Foundations for a Future History of Chinese Mapping." in J. B. Harley and David Woodward Ed.. *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 Vol. 2, Book 2: Cartography in the Traditional East and Southeast Asian*.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228-231.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其他（網路資料）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清朝三大實測地圖中的台灣〉，《地圖與遙測影像數位典藏計畫》地圖俱樂部，http://gis.rchss.sinica.edu.tw/mapdap/?p=2874&lang=zh-tw（2018年7月8日瀏覽）

中央研究院數位文化中心，〈數位方輿〉，「主題單元」，『地方行政區圖』，《臺灣前後山全圖》，http://digitalatlas.asdc.sinica.edu.tw/map.jsp?id=A103000058（2018年7月8日瀏覽）

科技部，《科技大觀園》，「飛覽古今——從古輿圖看家園」，快取版，https://scitechvista.nat.gov.tw/zh-tw/PopularScience/C/8/10/1/237.htm（2018年7月8日瀏覽）

張哲嘉，〈明代方志中的地圖史料〉，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演講稿，http://project.ncnu.edu.tw/jms/wp-content/uploads/2015/10/report2003ChangCC.pdf（2018年7月8日瀏覽）

雍正，《硃批諭旨》，四庫全書本，卷72，維基文庫，https://zh.m.wikisource.org/zh-hans/硃批諭旨_（四庫全書本）/卷072（2018年7月8日瀏覽）

Jean-Baptiste Du Halde（杜赫德），*Description Géographique, Historique, Chronologique, Politique 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中國帝國和蒙古地理、歷史、編年史、政治與自然情況的概述），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File:CEM-44-La-Chine-la-Tartarie-Chinoise-et-le-Thibet-1734-2568.jpg（2018年8月25日瀏覽）

劉亞軒，〈清初來華傳教士馬國賢與中西美術交流〉，融匯島，http://rhd361.com/special/news?id=7de4f06919374d089bd87e3c12a89feb（2018年7月8日瀏覽）

Jean Baptiste Bourguignon D'Anville（唐維爾），*Nouvel Atlas de la Chine, de la Tartarie chinoise et du Thibet*（中國、蒙古與西藏新地圖），Gallica（法國國家圖書館），http://gallica.bnf.fr/ark：/12148/btv1b53096745m（2018年7月8日瀏覽）

Jean-Baptiste Du Halde（杜赫德），*Description Géographique, Historique, Chronologique, Politique 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中國帝國和蒙古地理、歷史、編年史、政治與自然情況的概述），Gallica（法國國家圖書館），http://gallica.bnf.fr/ark:/12148/bpt6k54962623/f727.item（2018年7月8日瀏覽）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